

從國際政經觀點 看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與難題*

顏建發

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黃琬琚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研究員

摘要

中國自 1978 年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已獲取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已走出屬於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於西方所奉行的民主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國採取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強調國家所有權與市場經濟的優越性。而著實，在過去二十幾年的歲月裡，中國成功地通過了一連串的考驗，包括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入世、2008 全球性經濟危機。2006 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存底持有國。2010 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成就極為亮麗。

這篇論文將指出，在過去三十幾年的發展歷程中，許多促成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因素，實可納入涵蓋行動、結構與歷史過程這三層次的歷史結構途徑來分析。此外，中國這高度被納入世界分工的經濟發展，一直脫離不了以黨領政的政策作為，因此，放諸國際脈絡的政治經濟學角度乃成為探索此段歷程所不可或缺者。最後，論文也將指出一些隱藏在中國經濟發展背後的負面後果以及未來棘手的挑戰。

關鍵詞：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入世、2008 年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國經濟發展

* 作者特別感謝王崑義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教授的批評與指教。

壹、前言

中國自1978年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快速發展所帶動的綜合國力之提升，有了很傲人的成就。這個事實促使很多人相信中國已走出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而開始對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的內涵與特色，感到興趣。本文認為，中國所採取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確實讓中國脫離了1980年代前的貧困狀態，甚至，三十年的努力已讓其經濟體超越日本而直逼美國，並透過各種軟硬實力來提升其國際聲望與影響力，這不能不說是人類史上的一個特殊案例。從「手段-目的」的角度來衡量經濟成長，它的經濟手段是成功的。

就經濟生活的提升、經濟樣態的改變以經濟影響力的增進而言，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確實寫下極耀眼的一頁。而這樣的成果與其政府的集權特質、改革開放意識、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動態調整、以及廣大的人口資源為基礎實不可分割。同時，中國經濟的開放之所以成為可能，也與其背後有一個在戰後歷經三、四十幾年業已發展完備的國際分工體系為其依託，脫離不了干係。但不管如何，中國經濟發展的現象畢竟是過去三十幾年發展所歸納而得的，是後驗的。

於是，要解析中國的經濟發展，本文以為，自然必須要透過歷史發展的脈絡的梳理而獲致，在捕捉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質與結構特色之前，必須對於其歷史過程有所描繪，我們才能更清晰且具體地掌握歷史、結構與行動三者的互動關係；三者之間的關係，正如血肉、筋絡與骨架之間的關係，相生相成，互為表裡。除此之外，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析也不免涉及評價，而功與過常是一體之兩面。中國三、四十年的經濟改革開放過程，自有其正面而積極的表現，但同時也產生了很多的負面的後果，包括在經濟領域與非經濟領域之中。

貳、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的位階的變動過程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始於 1978 年，往後的過程中有幾個重要的轉折階段。其中，1992 年鄧小平的南巡後所開啟的第二次改革開放是重要的里程碑。而之後 1997 亞洲金融風暴、2001 年美國遭受恐怖攻擊、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則是關鍵到中國三個不同波段的位階之躍升的歷史契機

一、1997 亞洲金融風暴

1980-90 年代的亞太經濟基本上是美日歐（核心）、四小龍（半邊陲），與東南亞與中國大陸（邊陲）的分工關係。這一分工形勢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期。不過，中國的資源與能量的逐步釋放卻悄然地改變了這個結構。鄧小平 1992 年春南巡重新對外打開大門。此前，外商前往中國大陸不管在金額、技術或規模上都無法與東南亞相提並論，然而此後，情況卻逐漸往相反的方向翻轉。1994 年外匯兌換券與人民幣並軌，人民幣大幅貶值，中國的出口大振。自此更多包括在東南亞的外商紛紛往中國移動。從此，東南亞國家的競爭力逐步落於中國之後。1997 年 7 月 2 日在泰國引爆了亞洲金融風暴，東協五國遭遇嚴酷挑戰。風暴來得突然與劇烈，給東南亞的政治、經濟，乃至於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相對地，中國大陸因為外匯管制嚴格，資金難以自由進出，而得以豁免於投機客的炒作。在東協五國的經濟重挫以及體系潰敗後，中國得以成為替代的市場與加工地，相對地抬高了中國的經濟位階與角色。中國沿海很多充滿活力的城市都被推到半邊陲的經濟位階。自此，四小龍也面對中國崛起的競爭壓力，歷經考驗。

1999 年金融風暴底定後，中國崛起已成為事實。它不僅對於鄰國是重要的，對於美國亦然。其重要性不只在經濟，同時也在安全。而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所思考的，已不只是如何圍堵中國的擴張，更是與它交往並將它帶入一個可以預期的國際秩序之中。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變成是個很重要的議題。2000 年十月，美國給予中國永久貿易夥伴地位，已在為此鋪墊。這或許是一種對於 1999 年 5 月誤炸中國南斯拉夫使館的一種補償。

但不管如何，自此，美中關係已由戰略夥伴轉為競爭對象。

2001 年美國總統布希上台的國情咨文所提議建構之全國飛彈防禦系統 (NMD) 與區域飛彈防禦系統 (TMD)，以中國為假想敵的針對性，極為明顯。4 月 1 日中國軍機和美國 EP3 在海南島上空擦撞導致了兩國外交上嚴重的僵局。2001 年 7 月 13 日中國申辦奧運成功。中國歡欣鼓舞。美國在中國申辦奧運上不採取杯葛的態度，多少看出雙方外交斡旋已讓美中關係漸漸走出當年在 4 月 1 日美國偵察機 EP-3 與中國尾隨的軍機在海南島上空擦撞的陰霾。

二、2001 年美國遭受恐怖攻擊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本土遭受空前大規模的恐怖攻擊。不管是心理上或實質上，這是二次世界大以來遭受外敵最大的創傷。美國朝野一致對外，同仇敵愾。然不到一個月，美國已長驅直入阿富汗，並辦妥周邊國家的外交斡旋。對於中國而言，美國此舉等於進駐其後院，中國的安全受到威脅。但有鑒於美國的軍事投射力如此強勢，而其與周邊國家的外交斡旋如此周延，很快地，中國決定回到鄧小平「韜光養晦，不搞對抗」的戰略道路，全力於經濟發展，也就是所謂的「低頭搞建設」。而美國在進行反恐的軍事行動之際，特別需要中國多方的配合，包括在經貿合作、穩定北韓、以及聯合國決議上。於是中國也正好利用這種機會，順勢而為。中國於 11 月 10 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此外，由於根據 GATT 1994 第 24 條之規定，世貿組織可自發性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在締約會員間發展更密切結合經貿關係，於是，中國便在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前四天，也就是 11 月 6 日與東協達成成立自由貿易區的共識。第二年，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11 月，中國和東協 10 個成員國共同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在 2010 年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此舉意味著，中國將夾著將進 19 億人口的市場，在世界貿易組織內舉足輕重。而在美國那方面，進入阿富汗並未緝拿到賓拉登，美國又開始做尋找下一個目標的準備。從此，美中走不同的發展路線：美國則全力捲入反恐

戰爭，花費無度並四處樹敵；中國則全力拓展經濟，低頭搞建設，蓄存能量。

2003年3月美國進攻伊拉克，中國持續默默搞經濟。6月29日中國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10月17日，再與澳門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同時，有鑒於美國掌控伊拉克油源，2003年11月29日北京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從新的戰略全域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發展戰略，採取積極措施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此後，中國利用其豐沛的巨額順差留存海外，並到全世界各地投資或購買油田與礦藏。2004年6月初中國又積極促成「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包括9個省區（廣東、福建、江西、廣西、海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九省、區）和港澳兩個特區。很明顯地，以港澳為樞紐，中國南方的自由經貿圈與中國和東協之間的自由貿易圈，乃更加明朗。

回顧這一段歷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2001年中國的外匯存底為2,122億美元，到了2006年二月底止，中國外匯準備增加至8,537億美元，首度超過日本的8,501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同時，隨著微利時代的來臨，中國成為國際製造業最適合轉移的目標地。中國領導人善於從一個長程的戰略角度看問題，中國發展產業，志不只在滿足民眾消費，更是在搶占全球市場，而一旦外來投資者眾，並形成群聚效應後，內需市場便成為重心，而愈來愈多的產品可供應給內需市場。不只是麥當勞玩具、耐吉球鞋等「低科技」產品的世界工廠，中國也飢渴地吸納全球高科技產業進駐，宛如高科技產業資金、人才、資源的大黑洞。

三、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

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倒閉所連鎖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全世界和中國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然，為了力抗金融海嘯，中國中央接連推出各項擴大內需、振興經濟措施，將貨幣政策從「從緊」轉為「適度寬鬆」，其中4兆人民幣救市計劃，令世界震撼，其國際影響力乃藉由金融海嘯而進一步提升。在這裡，當時還在籌備中的上海世界博覽會無疑地也起了一

個讓經濟運行不致嚴重下墜的動力。中國的戰略成功，同時也抓到了發展的機會。反觀，美國卻一直深陷伊拉克的泥淖，直到 2010 年 8 月 31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宣佈開始自伊拉克撤軍，才有起色。據估算，美國投入約 7,473 億美金，而未來十年還需要再花約 5,880 億美金。當美國全力於反恐軍事行動之際，中國卻與周邊國家及世界各地發展友好外交與積極的經貿合作，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又再從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的方向轉變。經濟上的中國中心論於焉產生。時序進入 2010 年底，美國試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似有制衡中國中心論之意。然而以東協加六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將於今 (2013) 年啟動談判，並於 2015 年完成。此協議的簽署可望加快全球經濟向成長快速的亞太地區轉移，並可能成為美國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的勁敵。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前景如何，待進一步觀察。

參、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構特徵與面貌

毫無疑問地，自鄧小平 1992 年春南巡之後，中國歷經了二十年的發展，可以說挑戰艱鉅，渡過重重難關，並一路攀升而上，寫下了一頁輝煌的經濟史。而這段發展史透顯出了一些重要的結構特徵與面貌，可以由三個層面來闡述，即：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所共構的蜂窩框構、各自自主卻又一體的諸多地方經濟所聯盟而構成的國家大市場、以及提供機遇的國際雁行分工體系，茲分述如下：

一、「中央 - 地方」的行政架構

中國是政治集權的國家，但由於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在中央行政力有未逮之處，實際上留給了地方政府很大的自主空間，就像蜂窩裡面的坑坑洞洞，那象徵著中央政府行政力的極限處其實便是地方政府的自主空間的意味。中國的行政架構是一個由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所共構的結構關係，澳大利亞學者奧德麗·唐尼索恩 (Audrey Donnithorne) 在 1972 年曾將

這種獨特的經濟現象比喻成「蜂窩狀經濟」(cellular economy)。這種經濟結構其近代的根源始於大躍進時期，當時中國為了實現毛澤東超英趕美的發展目標，出於中央自身財力有限的考慮，只好下放權力於地方，發揮地方政府參與經濟建設的主動性。在以經濟協作區為單位組織經濟建設的同時，同意每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都建立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從而促成了經濟發展的分散化和分割化趨勢 (MBA 智庫百科，2013；Donnithorne, 1972)。

1978 年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是依著這個「中央 - 地方」架構，展開改革開放。過程中，地方政府也深深捲入了市場化的經濟洪流，地方分權與財政分權賦予了地方很大的自主空間，進而促使地方政府致力於經濟發展，並形成區域間的競爭。而雖然經濟權下放到地方，但中央卻仍牢牢掌握住政治集權，而形成中央政府有能力調動地方政府績效的狀況下，地方政府乃有誘因與機制得以推動經濟發展 (葉托，2013)。中國的幅員遼闊，在中央 - 地方分權的架構下，遍地開花，而中央仍掌握主要資源的分配，各省或區域的發展都在中央經濟藍圖與政策的指導下，期間所產生的群聚綜效，相當可觀，既是有效率，且是有效果的。這可以解釋何以，中國得以有急速擴展的沿海六大經濟發展區域，包括遼東半島、北京 - 天津迴廊、山東半島、長江三角洲、廈門 - 福州、珠江三角洲等 (大前研一，2003：71)。而中國在經過近三十年發展累積而成的製造業集群畢竟業已成型，在面對經濟條件的變遷，例如大幅調薪風潮，其基礎應仍不至於被撼動 (財經頻道，CCTV，2010)。當然，與此同時，這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競爭的機制與氛圍，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任意性、變通性與短期性，惡性競爭與地方政府球員兼裁判的角色衝突，也就無法避免了 (葉托，2013)。

二、內部大規模的市場

中國擁有諸多自主地方經濟所聯盟而構成的國家大市場：中國因地方經濟自主權大，而幅員廣闊，人口眾多，近 14 億，因此，理解中國經濟不宜以一般的「國家」，而毋寧用「區域」的角度來理解，更為妥貼。中國推動地區發展的模式，是採取政策傾斜策略，或產業政策、或財政政策、或

信貸政策等。在地區的發展上，中國政府遵循著鄧小平「摸石子過河」的策略方針，在中央政府主導，地方政府配合下，採取了誘導性的漸進式改革與開放，進行試點，由最早期的經濟特區，進入如上海浦東和天津濱海的新區，再進入所謂的試驗區。而依著有序的梯度發展策略，自 1980 年代以來，沿海、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以及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透過中央每五年的經濟計畫，以及對地方的政策傾斜以及對外資的開放，都已獲得高度的發展，同時，也發揮了地區與地區之間互動所構成的綜合效果，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

而以區域規模來比較，中國遠比東協，乃至於歐盟的系統整合更完備與縝密。例如，廣東與山東，雖稱是「省」實際上具有國家的規模與能量，而除了文化系統與政治系統外，山東與廣東有著標準化與一致性的經濟制度與工具，這是個高度整合的「區域」。大前研一主張將中國上述沿海的六大產業聚集區域分別當作六個獨立國家來分析，便可更清楚了解中國經際的能量。例如，以人均乘人口數的 GDP 來衡量，2000 年的中國除了福建區域排行 14 外，有五大區域都進入亞洲的前十名。那一年福建還在越南之前。如果將排行第 5 名的香港以及澳門與其它內陸部分加進來，其經濟規模更加可觀 (大前研一，2003：226-28)。

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中國中央政府其中一個特別明顯的策略是：透過基礎建設投資，配合地方政府出錢來帶動這些鄉鎮的發展。截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的統計，中國計有省級 34 個，地級 333 個，縣級 2,862 個，鄉鎮級 41,636 個 (百度知道，2011)。這一數目道出國家一旦全面性啟動發展巨輪，其基礎設施建設所帶動的水電、交通、通訊、建築等等的耐久財、民生基本用品、金融與商業服務以及文化休閒等等產業，自是十分驚人。中國專家龍安志 (Laurence J. Brahm) 斷言，在 21 世紀不會再有另一個已工業化國家或正在工業化的國家，能和中國一樣蓄勢成長和擴張 (龍安志，2002：12-15)，可謂精闢之論。

三、躍升中的國際分工位置

要了解中國經濟發展，務須將它安置在雁行模型的框架來思考。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其中國經濟模式所依附的雁行模型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是依附在國際雁行分工體系，也就是：美日歐（核心）四小龍（半邊陲），與東南亞與中國大陸（邊陲）的分工關係上；另一方面，中國境內不同層級的區域經濟也自成一套雁行的分工與發展脈絡。換言之，對外，中國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非常重要而強勢的一員，對內，中國不同經濟水平的經濟區乃構成了一個雁行的分工體系。此一分工特色正如謝德華（Edward Steinfeld）所指，他認為 1990 年代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外包（outsourcing）過程，外包是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將非核心業務外包給其他國家的企業，從而達到降低運行成本提高運行績效的目的。他指出，中國的工業結構調整是隨著國際貿易的變化而進行調整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工業通過受外貿影響而逐漸將結構調整外包給了外資企業（李華芳，2012）。當然，要成就這種分工，使之可能，機遇以及機遇的攫取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陳平，2009）。中國在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更大幅加入世界分工體系，正是雁行模式發展成熟、待轉型而需要新元素填入的時候。中國正躬逢其時：隨著 1994 年人民幣大幅貶值，中國逐漸成為亞洲最大的加工基地；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東南亞經濟崩潰，中國取而代之。亞洲金融風暴，讓中國不自主地躍升為半邊陲經濟的主體，自此，中國的經濟表現已在不同的層次了。

值得一提的是，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國入會，但一直要到 2006 才成為全會員。入會後，中國為回應世貿組織規定的要求，平均關稅由 15.3% 降到 9.8%。每年進口約 7,500 億美元的貨品，一共開放了 100 個不同類別的服務行業，也修改了約 2,300 條國內法。接著，2008 年，為了應對起於美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所引發外在需求降低的困境，中國政府投入總數達 4 兆人民幣的刺激經濟方案。2009 年，全球進口降低了 12.8%，中國卻還增加了 2.9%，是全球大經濟體唯一維持進口成長的國家。2010 年中國已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國與第二大進口國。2010 年進口量達 1.4 兆美元，占世界進

口量的 1/10。2010 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9 和 2010 中國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率超出 50%。2012 年中國的出口達 2.0489 兆美元，比諸 2001 年的 2,662 億美元，計在 12 年前後增長了 6.7 倍，仍維持世界第一（工商時報社論，2013）。

由此可見，過去十年中國成功地操作了其大國經濟戰略，藉由對外開放以及政府重商主義，造就而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國，成功地累積財富，而如今又轉而成為進口國，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進口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所得到的加乘效應為中國蓄存了豐沛的經濟能量，而藉之，中國又巧妙地由外銷主導逐漸轉向內需導向的投入，這又將使中國的經濟位階與格局更上層樓。無疑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動了中國在擴大貿易、帶動經濟改革、吸引較高層次的外資流入、塑造法治環境等等方面的進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十年間，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中國沿海六大產業區及香港包辦了亞太雁行模式半邊陲經濟帶的大部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展現出：在內部，加諸於中國政府與人民更多的責任與挑戰；在外部，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上，尤其是與美國與亞洲的關係上，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加入世貿組織後的十年，不僅是中國發展最快速的十年，也是與國際接軌最快的年代。而源於 2007-2009 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國轉而強調內需驅動與區域整合。中國的經濟維持高成長，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中國與周邊國家在實質議題尤其經貿上結盟需求乃越來越密切。全面對外開放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分工的主體，而全球性金融危機，讓中國趁勢躍身而為美國之外的另一個世界經濟中心。

2010 年，中國與亞洲國家的外貿高達 1.5 兆美金，是十年前的 4.5 倍，年成長平均 21%。在亞洲，而中國十大貿易夥伴中有六個來自亞洲，分別是日本、韓國、北朝鮮、蒙古、越南、馬來西亞。中國成為日本、澳洲、巴西、南非等國的最大出口市場。而台灣與中國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使得韓國跟日本跟中國簽屬自由貿易協定的壓力增大。在政策的推進下，亞太周邊國家分別與中國發展了更緊密的經貿關係，中國作為一個區域霸權的角色越來越明顯，而相對地，週邊國家對中國的期待與要求也更進一步加深。由於中國與東協已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區

內全面零關稅，因此，中國已成為東協的最大輸出對象國。中國在 2011-2015 年的第十二個五年計畫清楚載明，「雙邊互利的開放策略與對其它世界的更加開放」。在此計畫內，中國將以擴大對內進口與對外投資做為平衡長期以來對外出口與外來投資過多的傾斜現象。

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座落在一個極佳的地緣經濟位置：面對東北亞，中日韓三邊貿易額從 1999 年的一千三百多億美元增至 2011 年的六千九百多億美元，增長超過 4 倍。中國是日、韓兩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面對東南亞，立於 2002 年與東協建構的自由貿易區，使得中國在 2013 年即將啟動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 談判上，占盡優勢。「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是環繞東協十國加上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六國所構成的區域經濟，將是全球最大、人口超過三十億、產值超過世界總產值四分之一的自由貿易區。以美國為中心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產值則超過世界總產值的三分之一。隨著美國國力的衰退以及歐債危機，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亞太政經強權，已逐漸卓然成型。

肆、中國經濟發展的行動特徵

在此「行動」指涉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推動官本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與國營企業之經濟行為，也就是官本位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同於法國等國家資本主義以政府的力量大幅介入對於私營企業的扶助，中國是以政府的力量強力介入國營企業的經營。這就是官本位的涵意，是以權力與市場的結盟為特徵(維基百科, 2013a)。學術界對於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上的評價一般雖不否認其特有的政治任務，但多半從自由經濟的觀點，而傾向負面涵義，對於中國的國有企業自然也沒有例外。然而，不管是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所導致的東南亞與四小龍的艱辛發展或 2008 年底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其席捲海嘯般的經濟衰退，導致歐洲淪陷，而美國嚴重受挫，無論如何，中國都表現出一枝獨秀，而儼然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這些危機令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遭到懷疑，政府介入與主控的經濟發展模式則受到高度的青睞。成王敗寇。中國一黨獨大之體制，強調強有力的黨政

軍一體的領導，由於中國上層的權緊緊地抓在黨政軍一體的領導階層手中，發展的阻力容易排除，於是，以國有企業為發展經濟的基石與龍頭，從事「集中力量辦大事」之作為，乃成為中國經濟的獨特優勢之所在。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乃銳不可擋。

過去十幾年來，中國經濟全面的快速發展，導致世人對中國共產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策略，刮目相看。但對於此，中國內部也並非清一色歌功頌德，也有不少持保留意見者。有的認為，中國這種獨特發展容易導致人民自滿而放慢進一步的改革，也有認為，這是一種具有捧殺中國，要中國負擔更多國際責任陰謀的論點。有的認為，它還無法輸出或複製，有的認為它還在發展中，勝負未卜，仍有反覆，還存有危機。也有指出，中國目前的社會和制度處於劇烈的變動中，所謂中國模式並不存在（維基百科，2013a）。也有論點表示，在政策空間裡選擇了合適的政策處方，從而獲得了高品質的發展，恰恰表明普世價值和基本原則是跨越國界的（李華芳，2012）。有些則認為，中國這種經濟發展型態，未談得上成功，畢竟急速經濟發展和相對政治穩定，也付出了相當的社會代價（錢鋼，2010；羅志榮，2010）。

但不管如何，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較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路線與因應外來經濟危機的處理上，其政府一直是處於高度自主而未受到外來的干預，同時，其對內部的管控也比其它發展中國家相對更為強勢而有效（陳平，2009）。而無疑地，籠統地總結中國過去改革開放以來快速穩定的經濟發展經驗，它實際上蘊藏了「政府主導、實用主義、大膽試驗、循序漸進」的內涵（何順文，2012）。其中，政府主導正是官本位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

但政府主導如何可能？無疑地，國家財政強大，政府手頭寬裕，讓中國的經濟計劃更有施展的空間。全世界作比較，在預算收入上，美國為世界第一，固兩倍於中國，但中國也不弱，占世界第 5 位，台灣則居 36 位；在公債占 GDP 的份額上，日本第一，占 GDP 的 225%，最嚴重；美國第 37 位，占 GDP 的 58.9%；中國則世界第 113 位，占 GDP 的 17.5%。收入多，債務少，如此，中國政府操控政策的能力相對強了很多，籌碼也相對多很多。在頒布的十二五計畫（2011-2015）中，中國提出了經濟發展模式的三

個轉變，也就是：重心由投資與出口轉變到提升內需消費與分散出口市場；產業結構由製造業轉變到服務業為重；由量的擴張轉變到質的提升，也就是生產模式的改變（Allatany's Newspaper Guide, 2011）。在經濟戰略的規劃上，中國希望將「世界工廠」的地位轉變為「世界市場」，而其所提出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動汽車、生物育種、新醫藥、新材料及新一代信息技術等，自然都是需要有政府的預算的投入或政策的開放來帶動。

至於上述所指的實用主義、大膽試驗、循序漸進，也深植於中國的官員與一般投入經濟活動者。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過程中，鄧小平的「不管黑貓或是白貓，會抓老鼠的便是好貓」或「摸石子過河」常為經濟官員與學者所津津樂道的實踐思維。鄧小平思想導出一種強調實用主義、大膽試驗與循序漸進的行為準則。高盛公司的顧問約書亞·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曾點出，中國的發展經驗中，充滿了靈活應變的經驗，更像是一種務實的處世方法而並非一套所謂的成熟理論（李華芳，2012）。同時，試點、分流的漸進式改革也是實踐過程中最常見的特色。中國政府一般在推動新方案，都會採取試點，如此，既避免了一旦錯誤會產生大規模的損失，又有助於風向的測試，同時也可以提供後續跟進力量與資金的一段準備時間。溫和的漸進模式，也給外來投資者更強的信心。分流則排除一刀切的弊病；因時、因地或因事的作為，也讓資源的運用與配置得以相對合理。

伍、中國經濟發展遭遇的難題

從「行動 vs. 結構」這組概念去解析中國的經濟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儘管自 2012 年起中國的經濟成長已趨緩，但對照於美日經濟的低迷與歐洲經濟的潰敗或衰退，中國仍可望維持世界經濟成長之引擎的角色。而不管中國經濟所展現的是模式或個案，或姑且不論其功過，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所歷經的經濟發展過程，確實在人類的經濟史上寫下了很特殊而耀眼的篇章。然而，一事可做兩面觀，上述所陳的正面發展中，也透顯出許多負面的評價，茲分述如下：

一、「經濟傾中，安全傾美」的國際政經效應

不管如何，中國經濟的崛起，委實伴隨著美國經濟衰退的事實。美國經濟的衰退部分原因固來自於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的巨額耗費與內部經濟結構與政策，但中國因素也難辭其咎。至少美方認知，中國經濟崛起加速美國製造業的衰退，過去十年幾乎是以 25% 的比率在萎縮中。來自中國的進口貨使得美中的貿易赤字增加到 2,730 億美元。中國嚴重侵犯智慧財產權、規則不透明、未遵守 WTO 規範的開放日期、拖延人民幣升值、低利政策貸款補助其國內企業等現象，造成美國企業在競爭過程中遭到不公平的對待。中美經濟失衡同時引來美國左翼和右翼發出不滿聲音。美中關係陷入更困難的處境。美方指控：中國並未走向市場資本主義 (market capitalism) 而是國家重商主義 (state mercantilism)。而根本上，中國為中心的亞太經貿秩序已顯然挑戰到美國為中心的霸權地位，讓美國的戰略家忐忑不安，而思制衡之道。

2009 年 7 月國務卿柯林頓鄭重宣佈美國重返亞洲。繼之，始於 2010 年上半的釣魚台事件以及南海紛爭過程，顯示日韓與越南等國家背後有美國撐腰。歐巴馬總統於 2011 年 11 月 13 日宣布，美國將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強調確保高環境和勞動標準，並設法解決關稅以外的新障礙，作為領導快速成長的亞太地區的新倡議，被視為是對中國崛起的一種對策。而雖然日本立即呼應成為第 10 個成員，而此架構據聞將囊括全球逾 1/3 的產值，然此倡議固來勢洶洶，畢竟屬新生事物，猶待考驗。亞太諸國在經濟上，因為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實質關係，經濟被迫仍需向中國傾斜，只是有趣的是，在安全上週邊國家卻明顯地向美國靠攏。自 2010 年以來，中國在東海與南海分別與日本、菲律賓與越南起嚴重的衝突，而美國則為這些國家依靠的對象，不只如此，反中氣氛也將印度與俄羅斯力量帶進來這場權力的競逐。曾幾何時，中國還高唱和平發展，四處左右逢源，但今日的中國其周邊關係卻一落千丈，實令人甚為驚奇。

二、市場「國進民退」的效應

質疑派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以犧牲國民利益為代價的國家資本主義，也是一種權貴資本主義。中國 2010 年的財政收入比上年增長 11.7%，高於 GDP 增長 3%。而何以在大幅度巨額經濟刺激計劃的情況下，財政收入不減反增呢？有評論指出，這意味著，儘管做大了蛋糕，但政府拿走了更多，民間獲得的份額相對減少。而在各級政府與民爭利、政府財政投資邊際收益遞減、民間資本遭到擠壓的情況下，無處可去的民間資本只有大量進入股市和樓市，並推高了資產的泡沫化危機（錢鋼，2010）。政治強調集中，經濟強調開放，其結果是權力更往上層集中，而產生一種強幹弱枝的嚴重失衡現象。改革開放的結果實際上並未造成私有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反而因為國家資本過度壟斷而使得私有經濟市場趨於萎縮不前。不僅如此，官本位的經濟發展導致政府投資饑渴，從而使地方政府債台高築，潛在的債務危機重重，並對於中國的財政產生巨大的負擔，而這個負擔最終將成為納稅人的沉重負擔。

當前政府手中支配著國營事業，雖有時幫忙解決了政治難題，如拯救失業問題，卻犧牲了效率。而政府獨大，少受制度性約束，自然抑制不了干預市場作為的衝動，就以當前國營企業走出去來看，甚至用外匯存底去挾注走出去的國企，被視為義舉，卻暗地裡成為政府維持其在市場影響力的口實。只是這些政策雖然都是用來幫助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與轉型，但其所產生扭曲，卻對於市場、乃至於整個經濟體系帶來傷害，包括「國進民退」的問題。改革過程，政府祭出一些規則約束市場，但它自身的力量與存在也伸進去了，其影響的範圍也許是更寬闊，而運作更不透明（Yueh, 2011: 677）。

三、貪污腐化與分配不合理

中國的領導階層黨政軍一把抓，國家資本成為經濟之重心。國家資本雖壯大卻因為黨政軍權力膨脹，缺乏民意監督，決策與執行過程不透明，而產生了人謀不臧、權錢交易的現象，同時，人治與私利橫流，既延緩也

破壞了普遍性經濟體制的建立，因而導致中國的經濟力雖快速茁壯與累積，卻缺乏一個健全而平衡的經濟體制來支撐；裙帶或貪腐勾結情事深藏其間。在長期官本位的經濟體制下，中國經濟呈現的光景是：強政府，弱社會；強少數，弱大眾。換言之，中國的分配呈現個體貧，集體富，而少數掌控或寄生在集體上之個體從中撈取利益與財富，形成所謂的特權階級。

美國彭博新聞社披露中共八大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彭真、薄一波、楊尚昆、宋任窮的後代，憑藉權勢斂財的事實，令人怵目驚心。報導指出，中共八大元老的後人，透過特權，獲取暴利，壟斷經營，更在所謂的「國企轉制」的改革過程中，將國有轉為私有，而一夕致富。《紐約時報》則揭露前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戴相龍家族，借助權力之手，低價收購股票、利用「中國平安保險公司」一手導演前衰後興而獲取暴利的劇情。此外，據彭博社統計，僅王震之子王軍、鄧小平女婿賀平、陳雲之子陳元三人所控公司的總市值，就高達1.6萬億美元（即10萬億人民幣），相當於中國全年經濟總產值的五分之一。而八老之後，總計103人，半數居住國外。而炫富，成為這幫紅二代、紅三代的公開標識（陳破空，2013）。這一類的數據是否科學與客觀，吾人不得而知。但可以確知的是，至今中國政府並未做出辯白與澄清，倒是習李防腐倡廉的動作頻頻，讓人對中國貪腐問題的嚴重深信不疑。

四、生存環境的嚴酷挑戰

這些年來中國出口部門的成長，相當依賴勞力密集加工出口品的生產，以致於造成了勞動人口的過度流動以及過度耗用土地、能源、材料以及環境汙染等問題（工商時報社論，2013）。在經濟發展掛帥的場景下，資源短缺、環境惡化，以及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乃日益嚴重（李華芳，2012）。一些潛在的負面因素正在侵蝕其經濟持續成長的基礎，造成未來很大的挑戰與困難。

無獨有偶，中國的人力資源也逐步走下坡。依聯合國的標準，中國實

際上已跨過高齡社會門檻¹。2011 年底，中國 60 歲老齡人口已達 1.85 億，占當時人口總數 13.7% 以上。60 歲以上老齡人口將於 2040 年前後達到 4 億左右（維基百科，2013b）。人口老化使中國未來在財政、社會福利、退休年金、醫療與老人關照上，面臨源源不絕的困境。在城鄉發展失衡的狀況下，鄉村貧窮問題有日益惡化之勢，很多農民已失其生計之所賴。與此同時，都市的成長需要更多土地的使用，導致了更多人失去土地。中國需仰賴農村地區釋放大量的過剩勞動，但這部份的勞動力雖然數量大，品質卻低且流動高，讓勞力的供應充滿很高的不確定性。農業與工業、鄉村與都市之間的矛盾、制度轉型所暴露的隱性失業與低度重新就業的困難在在成為中國的艱鉅挑戰。

中國人口多、資源稀有、資本缺乏、環境脆弱。但在經濟政策上，中國由於過度偏重重工業的發展，導致煤、電、燃料、船運和其他資源的不足，這加速了增加中國對能源的需求的壓力，中國的經濟安全將面臨很大的潛在威脅。事實上，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燃料消費與進口國。重工業的過度發展將加速對於既有脆弱的生態系統的摧殘。它會惡化經濟環境。這將威脅中國基本的製造條件與生活環境（Wu, 2005）。

貧富差距日益懸殊表現在區域、城鄉與階級之間。都市與鄉村、內陸與沿海之間差距兩極化正急速拉大；都市居民與鄉村農民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數十億的財富流向企業家等少數人群，但大部分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卻十分緩慢。在基尼係數（GINI）方面，今（2013）年 1 月 18 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 2012 年基尼係數為 0.474，雖然比 2008 年的高值 0.491 有所回落，但仍顯示中國收入差距較大的事實。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局長馬建堂表示，中國仍然是全球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巴西、阿根廷和俄羅斯分別為 0.55、0.46 和 0.40（KTSF, 2013）。

據統計，2008 年在新扶貧標準以下的扶貧對象為 4,007 萬人，反而比 2007 年增加了 2,528 萬人。中國官方現行扶貧標準只相當於國際水平的

¹ 依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百分之七時，稱為「老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

65.53%。按照國際標準計算的中國貧困人口數在國際上仍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度，農村貧困人口占中國貧困人口的 90%。2009 年 12 月 18 日，溫家寶總理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領導人會議上提出，按照國際標準中國還有 1.5 億農村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09 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75 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5,153 元，絕對差距從 2000 年的 3,748 元擴大到 12,022 元，首次突破 1 萬元 (黃海燕，2010)。貧富差距級距上昇之情形，可見一斑。

陸、結語

基本上，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型態正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斷地在開展之中。經濟全球化的邏輯意味著不僅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藩籬的進一步去除，中國境內的藩籬也須逐步去除。經濟結構的自由化無可避免地，也伴隨政治自由化的強烈需求。政治自由化的需求不僅是經濟結構再上層樓的必需，也是政治範疇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中國內部的發展到了習李體制的階段正好面臨「經濟崛起」邁入成熟境界，而逐漸趨緩而走下，但同於此時，其「政治崛起」與「社會崛起」的勢頭才剛出現萌芽。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極不明朗。中國內部有關對於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的改革呼聲日益高漲，外部則是劍拔弩張，此刻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與週邊國家關係最惡化的階段。準此，中國想成為世界發展的模範，仍為時過早 (Ma, 2012: 5)。在當前中國內憂與外患正同步加劇之際，面對這一種兩重的困境，中國領導人的難題是：一方面要持續發展經濟成長以維持合法性，並做好財富分配，給弱勢窮人提供機會，一方面，要配合改革開放與國際經濟接軌後，在政治制度上的接軌，另一方面，則需恢復與周邊各國的睦鄰關係，以讓支撐經濟榮景的和平氛圍得以存續。

只是，中國方面的戰略學界卻有傳出，過去韜光養晦的低姿態有調整必要的呼聲，同時，也表達出中國傾向相信美國仍沒有意願接納與順應一個成長中的中國 (Ma, 2012: 9)。這是不是北京政府戰略心態的一種反應或風向球，值得關注。無論如何，中國畢竟是個超級大國。對於中國這樣一

個以「區域」勝於「國家」的角度來理解的實體，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領導班，究竟準備將中國帶往何處，所謂的中國經濟發展型態究竟是資產還是負債，以及以美國為首的民主社會將如何看待與應對，在在成為未來國際社會的緊要課題。

參考書目

- 大前研一，2003。《中華聯邦》。台北：商周出版。
- 工商時報社論，2013。〈小龍年看大陸經濟的「量變」與「質變」〉2月17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3/122013021700076.tml>) (2013/2/17)。
- 《百度知道》，2011。〈中國多少個行政村〉11月7日(<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6125494.html>) (2013/2/16)。
- 何順文，2012。〈中國模式的解讀與反思〉9月25日(<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usa/uslocal/singtao/20120925/09093810016.html>) (2013/2/16)。
- 李華芳，2012。〈中國模式的爭議〉12月12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2ecb5.html) (2013/2/16)。
- 陳平，2009。〈中國模式的爭議與中國道路的探索〉《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2月7日(<http://peacehall.com/forum/201202/lilun/2541.shtml>) (2013/2/16)。
- 破空，2013。〈八老後人大舉斂財，中國是他們的？〉《自由亞洲電台》1月1日(<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01022013100435.html>) (2013/2/16)。
- 黃海燕，2010。〈對中國農村反貧困的思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0月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2902453.html>) (2013/2/16)。
- 葉托，2013。〈中國地方政府行為研究的兩個途徑〉《中國社會科學報》(http://www.cctb.net/llyj/xswtyj/zfcx/201301/t20130106_36757.htm) (2013/2/16)。
- 《新聞視頻中心，KTSF》，2013。〈中國公佈基尼係數 減小收入差距迫在眉睫〉18日(<http://www.ktsf.com/china-reports-income-gap-says-action-needed>) (2013/2/16)。
- 維基百科，2013a。〈中國模式〉1月18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A8%A1%E5%BC%8F>) (2013/2/16)。
- 維基百科，2013b。〈人口老化〉1月2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 (2013/3/2)。
- 錢鋼，2010年。〈再談中國模式：爭議與價值分化〉《傳媒透視》(http://rthk.hk/mediadigest/20100315_76_122577.html) (2013/2/16)。
- 龍安志 (Laurence J. Brahm)，2002。《中國的世紀》。台北：商周出版。
- 《MBA 智庫百科》，2013。〈區域經濟體化〉2月5日(<http://wiki.mbalib.com/zh-tw>) (2013/2/16)。
- 羅志榮，2010。〈國企崛起是“中國模式”優勢的重要體現〉《人民網》2月11日(<http://ccnews.people.com.cn/GB/10971543.html>) (2013/2/16)。
- 《財經頻道，CCTV》，2010。〈加薪爭議折射中國模式之困：最痛的恰是最需要改變的〉《新華網》7月9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 (2013/2/16)。

com/fortune/2010-07/09/c_12316581_2.htm) (2013/2/16) 。

Allatans Newspaper Guide. 2011. "China Seeking to Transform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RIETI. December 9. (<http://www.rieti.go.jp/en/china/11121301.htmlk>) (2013/2/16).

Donnithorne, Audrey. 1972. "China's Cellular Economy: Some Economic Trend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52, pp. 605-19.

Ma, Lian. 2013. "Thinking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Chinese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3, No. 1, pp. 155-68.

Wu, Jinglian. 2005. "China's Heavy Industry Delusion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 pp. 56-57.

Yueh, Linda. 2011. "The Chinese box: The Opaque Economic Borders of the Chinese Stat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27, No. 4, pp. 658-79.

The Appraisals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Jiann-fa Yan

*Associate Profess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en Hsin University
Jhongli, Taoyuan, TAIWAN*

Wan Chun Huang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Chinese Affair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fter 1978, China has achieved the most remark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Most of scholars believe that China has come out of its own developmental model. In contrast to the western-advocated economic type based upon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 economy, China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upon the so-called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essing the superiority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the superiority of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many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e analyzed from a historico-structural approach, covering three levels: action,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process. Beside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ell-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is strongly managed by the party-dominated government; thus, the politico-economic perspective in the global contexts is crucial to the historical inquiry. Finally, this paper will also point out some hidden negative consequences and coming thorny challenges behind the economic miracle.

Keyword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ccession to the WTO, 2008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